



清 郎世寧 乾隆帝（青年時期）朝服像 軸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CC0）

乾隆御筆〈熱河考〉緯絲與盛清地理知識

■ 孔令偉

作為滿洲皇帝的夏季行宮以及接待外藩的重要場所，承德避暑山莊的建立與運作，對於清朝的政治、經濟及宗教等不同面向，曾發揮關鍵影響。隨著十七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前期清朝版圖在內陸亞洲（Inner Asia）地區的擴張，避暑山莊成為滿、蒙、藏、漢、回等多族群文化交流的重要歷史舞臺。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仿效布達拉宮、扎什倫布寺等西藏寺院形制而建的外八廟，以及用五體文字書寫的麗正門門額，由是誕生。避暑山莊的文化多元性，實深刻體現清朝作為帝國的複雜性與包容性。避暑山莊與帝國擴張的聯動，在促成多語種書寫以及跨族群交流的同時，亦帶動盛清地理知識的發展，其中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1736-1796 在位）〈御筆熱河考〉緯絲，便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實例。



圖1 清 乾隆 〈御筆熱河考〉緯絲引首



圖3 清 乾隆 〈御筆熱河考〉緯絲滿文局部



圖2 清 乾隆 〈御筆熱河考〉緯絲漢文局部

形制與版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有乾隆〈御筆熱河考〉（滿文 Ze ho birai kimcin，以下簡稱院藏本）絹質緯絲一卷，兼書滿漢文字。引首縱 36.8 公分、橫 99.4 公分，上有墨色織文「武列徵源」四字，並朱色繡印「乾隆御筆」，皆為漢字。（圖 1）本幅尺寸縱 36.8 公分、橫 461 公分。漢文正文

題為〈熱河考〉，右起左行，係據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御書緯織而成，前織「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以及「游六藝圃」篆體印文三通，後繡「乾」、「隆」、「幾暇臨池」印文三通，均為乾隆帝御用私章。¹（圖 2）院藏本緯絲漢文正文後繡有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御製跋文，係時任太子少保、



圖4 清 乾隆 御筆熱河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絲000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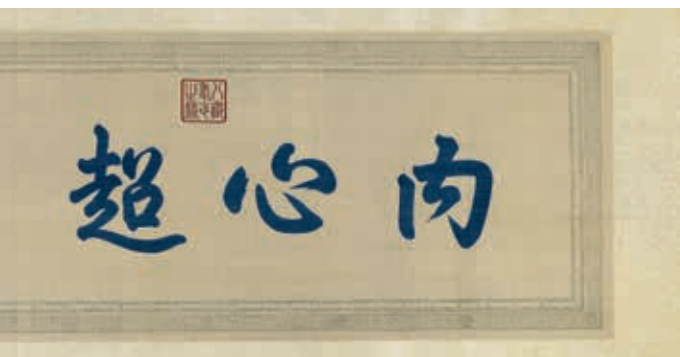


圖8 清 乾隆 御筆反蘇軾超然臺記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絲000008

戶部尚書、軍機大臣的董誥（1740-1818）奉敕抄寫字跡，並非乾隆帝御書；該跋文內容亦收入乾隆《御製文三集》（卷十，頁642），題為〈重訂熱河考跋〉。值得注意的是，對岸北京故宮博物院亦藏有漢文〈熱河考〉緯絲一卷，²本幅字跡、形制、用印與上述院藏本相仿，惟其無書滿文且闕御製跋文。筆者下文的考證將指出，

北京故宮本當成於乾隆三十三年至三十九年間（1768-1769）；至於院藏本則成於乾隆五十九至六十年間（1794-1795）。

至於滿文部分左起右行，正文前鈐有「太上皇帝之寶」與「秀起堂寶」兩通鑑藏寶璽（圖3），據此可知院藏本緯絲曾收儲於避暑山莊西南隅的秀起堂。滿文正文後亦附乾隆五十九



年御製跋文，二者內容雖皆與漢文正文、跋文大體對應，卻非完全相同。其中滿、漢文本最為顯著的内容差異，在於院藏本緯絲正文部分，滿文較漢文多出八處注釋小字。（圖4）然檢視《御製文集》（卷二十一，頁414-417）所錄〈熱河考〉漢文，其中亦附有八處注釋小字。比較院藏本、北京故宮本與《御製文集》的版本差異，

可以推測〈熱河考〉漢文最初形成時並無注釋，緯絲本滿文以及《御製文集》漢文之小字係後來增補。

院藏本裝裱精美，本幅前附雲龍緯系包首、玉鸞（圖5），外裏錦袱（圖6），並收儲於雕龍木匣內。（圖7）究其緯絲工藝與裝裱風格，頗類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乾隆〈御筆反蘇軾超然臺記說〉（圖8），二者均由蘇州織造經手。

文獻考據與實地見聞

在乾隆帝為數眾多的御製詩文中，〈熱河考〉具有相對特殊的地位，其文本歷史脈絡複雜而多元。據其內文並結合《起居注》、《清實錄》等相關記載，可知〈熱河考〉最初乃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十日至十五日皇帝駐蹕避暑山莊期間寫就。³ 乾隆帝在〈熱河考〉中自稱「近勅儒臣輯《熱河志》，故考其源，俾知所從事」，



圖5 清 乾隆 〈御筆熱河考〉附雲龍緯絲包首、玉簪

可見其書寫動機與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後清廷纂修《熱河志》直接相關。惟更深刻地說，〈熱河考〉的形成須進一步置於清代考據學風及官方地理調查等特殊歷史脈絡中來理解。

在考據學風興盛的背景下，清代學者對以《水經注》為代表的地理著作頗為留意，從而對古今山川源流有所考辨訂正，其中《水經注》記述塞外江河時曾謂「濡水又東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⁴這也促成清人試圖釐定古人所謂濡水、武列水究竟分別對應當時遼西哪條河流。與此同時，隨著十八世紀清帝國版圖的擴張，清廷亦屢次派員前往青藏、回疆諸地進行實地調查，從而形成盛清官方強調文獻考證與實地見聞並重的地理知識傳統。⁵在上述時空以及文化脈絡下，乾隆帝駐蹕山莊幾暇

之餘，對熱河源頭產生好奇心，並懷疑時人將熱河比附為濡水源頭之說，因此派遣喀喇沁郡王拉特納錫第（1739-1787 在位）以及內大臣努三前往實地探勘，並探得熱河源頭於察汗陀羅海之地（今河北省承德市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東南部蘭旗卡倫一帶）。在該次實地考察並結合《水經注》考證的基礎上，乾隆帝撰成〈熱河考〉一文，認定熱河乃《水經注》所謂武列水而非濡水，至於所謂濡水當為灤河，而熱河當為灤河支流。此外，在未考量古代河流改道的可能情況下，乾隆帝試圖進一步以當時調查成果，糾正《水經注》對三藏水（即武列河三條支流）合流次序的描述，並將古代三藏水勘定為清代固都爾呼、茅溝、賽音郭勒三條河流。為進一步廓清灤河與濡水之關係，乾隆帝復另

作〈灤河濡水源考證〉一文，與〈熱河考〉一同收入《御製文二集》（卷二十二，頁418-423）。

除了清人對《水經注》的關注外，乾隆帝對熱河等水文地理知識的求索，亦與清帝國的版圖擴張息息相關。繼消滅準噶爾汗國後，清廷又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剿滅大小和卓，正式將新疆納入勢力範圍。隨著對新疆的掌控，清朝官方通過軍隊、使者之實地見聞擴張其西域地理知識，並試圖將黃河源頭追溯至前人足跡未至之西域。在這個背景下，乾隆帝於〈熱河考〉中強調清朝版圖擴張與地理知識開拓之關聯：

昔〈禹貢〉載導河自積石，或以爲亦若江之岷山、淮之桐柏矣。及今平定回部，乃知河源自認嶺以東之和闐、葉爾忽諸水潄爲蒲昌海，伏流地中，復出爲星宿海，至積石始名黃河。則大禹所記，亦第就目所經見者而言。道元又安能以所未經見者，而一一詳訂其曲折也耶？苟非命使親履其地，烏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乎？

通過派遣地理考察團，乾隆帝在釐定熱河水文的同時，亦展現其廓清黃河源以訂正《尚書·禹貢》、《水經注》之雄心。乾隆四十七年（1782）上諭四庫館臣編纂《河源紀略》時，嘗謂：「朕從前爲〈熱河考〉，即言河源自認嶺以東之和闐、葉爾羌諸水，潄爲蒲昌海」。⁶由此可見，乾隆帝寫作〈熱河考〉與其後來派員實地勘查黃河源之舉，二者間實有思想上的聯繫。

製作、流通與增訂

在文獻考據與實地見聞之外，〈熱河考〉之重要歷史意義，亦體現在其文本流傳形式與途徑之多元。就文獻材質以及形制而言，〈熱河考〉曾被以紙本、緯絲、玉冊、墨刻、木刻等不同方式製作、收藏乃至流通。根據其跋文及文本內容，可知〈熱河考〉最初乃乾隆三十三年秋駐蹕避暑山莊時御筆成文，最初應以水墨橫披的形式書寫於紙張上，並由內務府造辦處進行後續裝裱。關於其中原委，《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載，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首領董五



圖6 清 乾隆 〈御筆熱河考〉附錦袱



圖7 清 乾隆 〈御筆熱河考〉附雕龍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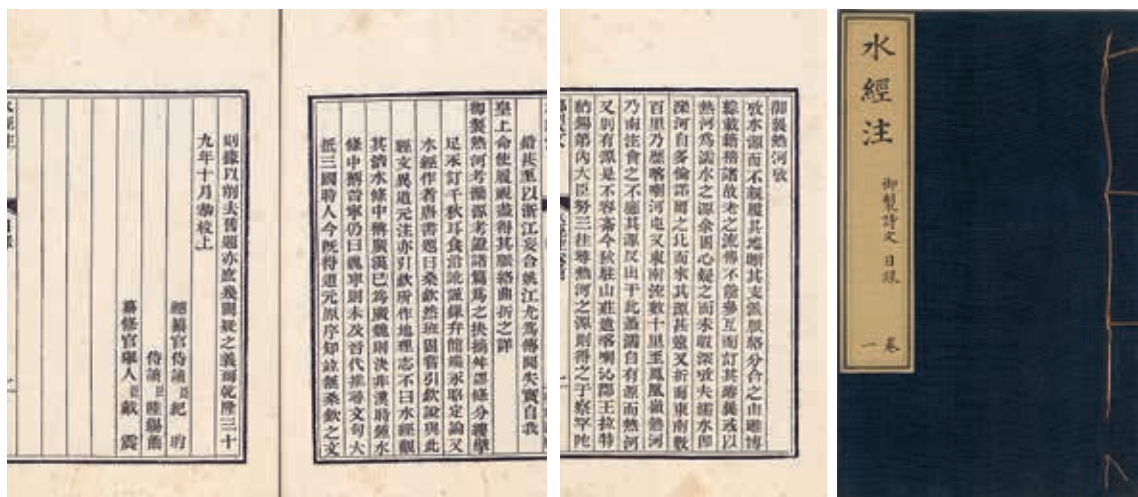


圖9 漢 桑欽撰 後魏 酈道元注 《水經注》 清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聚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018684

經交御筆〈熱河考〉橫披字一張……傳旨：『將〈熱河考〉字樣手卷一卷』。⁷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四月「董五經交御筆〈熱河考〉手卷一卷……傳旨：『俱配袱子樣子，發往南邊，依前做法照樣做來』」。⁸同年七月，董五經又再次交來「畫龍黃箋紙〈熱河考〉一張」，乾隆帝令內府「鑲一寸藍綾邊貼」。⁹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月，內務府稱「太監鄂魯里交御筆黃箋紙〈熱河考〉字橫披一張。隨：引首四個大字本文一張、包首紙樣一張、玉鶯紙樣一張。傳旨：『發往蘇州裱做手卷一卷，照天鹿錦做法，配雲龍包首，配袱鶯匣，其引首週圍畫宋花邊，欽此。』」關於該份御筆黃箋紙〈熱河考〉，後續內府又於同檔註記「於五十年四月二十七日，蘇州送到裱做手卷一卷、緯系包首、玉鶯、錦袱、雕龍匣呈進，安奉三無私，訖。」¹⁰可見〈熱河考〉成文後，曾數次以御筆紙本橫批的形式，由內務府送往蘇州裝裱成卷。

不僅如此，在乾隆朝宮廷時興緯絲藝術的背景下，內務府曾受命參考紙本〈熱河考〉裝

裱形制，製作數份緯絲卷軸。前引《活計檔》乾隆五十年四月二十七日註記稱蘇州裝裱之〈熱河考〉手卷配有緯系包首、玉鶯、錦袱、雕龍匣等描述，與院藏本裝裱相符。（見圖5～7）又北京故宮藏〈熱河考〉緯絲，其前引首四周內、外框分別繡有藍白相間之宋花與卷草等紋飾，風格正與上引《活計檔》所述乾隆四十九年十月〈熱河考〉黃箋紙手卷發往蘇州所裝裱之「引首週圍畫宋花邊」相符。¹¹由此可推斷，院藏本以及北京故宮本〈熱河考〉緯絲，與《活計檔》所載蘇州裝裱手卷，在形制、風格上具有一定關聯。

此外，〈熱河考〉亦曾被製作成玉冊、墨刻、木刻等形式收藏乃至流通。如《活計檔》載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太監鄂魯里交刻〈熱河考〉青玉冊頁一分。傳旨：『著配紫檀木拉道填金罩蓋匣一件。』」隨後內府又「於四十八年正月初七日，將刻〈熱河考〉青玉冊頁一分，配得紫檀木拉道填金罩蓋匣，盛裝呈覽。奉旨：『交永和帶往熱河，欽此。』」¹²這類玉冊一直到光緒年間仍保存在避暑山莊中，光緒十一年（1885）

十二月《內務府陳設檔》便載東所殿收有「高宗御筆〈熱河考〉玉版冊頁一冊。計六頁，紫檀嵌銅片匣盛」。¹³

相較於主要收儲於清宮大內中的紙本、緞絲與玉冊藏品，〈熱河考〉文本通過刻本印刷的形式獲得進一步流通。除了被收入乾隆《御製文集》外，〈熱河考〉又因《水經注》武英殿本之刊刻，對清代士人造成一定影響。乾隆三十九年（1774）清廷以戴震（1724-1777）所校《水經注》入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刊行（圖9），其卷首開篇便收錄乾隆御製〈熱河考〉以及〈灤河濡水源考證〉這兩篇相關之考證文字。此外，殿本所附校案稱：「至塞外羣流，江南諸派，道元足跡皆所未經。故于灤河之正源，三藏水之次序，白檀、要陽之建置，俱不免附會乖錯……自我皇上命使履視，盡得其脈絡曲折之詳，御製〈熱河考〉、〈灤源考證〉諸篇，爲之抉摘舛謬，條分縷棼，足永訂千秋耳食沿訛」。¹⁴ 這段案語顯示戴震等館臣在校讀《水經注》時，曾參考〈熱河考〉，並最終將其收錄殿本卷首。隨著《水經注》殿本的刊刻，〈熱河考〉也在清代廣爲士人所悉。值得注意的是，《水經注》殿本卷首所錄〈熱河考〉漢文附八處注釋小字，正與院藏本緞絲滿文內容對應。¹⁵ 由此可以推斷，〈熱河考〉於乾隆三十三年初成時原無夾注，八處小字係於乾隆三十九年《水經注》殿本刊刻前補入。

除了乾隆三十九年前加入正文注釋外，乾隆五十九年又於正文之後增補御製〈重訂熱河考跋〉，乾隆帝並於同年底令內務府製作新版墨刻，賞賜共一百零九位諸阿哥、群臣。此後受賞者紛紛上奏謝恩，盛讚乾隆帝以〈熱河考〉訂正《水經注》訛誤並廓清武列源流之創舉。¹⁶ 如乾隆六十年（1795）儒臣阮元（1764-1849）

「接奉御賜御筆〈熱河考御識〉墨刻一卷」，¹⁷ 隨即上摺謝恩稱：

臣伏思濡水久訛，河源彌遠，舜禹之世，畧在西荒，漢唐以來，陷於絕國，惟我皇上削平四部落（按：指清人所謂四厄魯特），休養卅餘年。金河百道，何異山莊武列之川；〈禹貢〉一篇，未似御製〈河源之考〉，蓋能通二萬里未通之地，故得決四千年未決之疑。¹⁸

由此可見，〈熱河考〉經由殿本刊行以及賞賜群臣等渠道，曾影響戴震、阮元等乾嘉學者的地理知識，體現了清代考據學風與帝國版圖擴張二者間的互動。

滿文譯寫

通過現存史料以及版本整理，可以推測〈熱河考〉最初係由漢文書寫，後被譯爲滿文。故宮院藏〈熱河考〉緞絲漢文正文、跋文字體，分別爲乾隆帝與董誥所書；至於滿文〈熱河考〉正文、跋文部分之繕寫者，則皆爲同一人，題記稱「臣吉隆阿奉敕敬書」（滿文 *amban girungga hese be dahame gingguleme araha*），可知滿文字體非乾隆御筆。吉隆阿（1759-?）曾於乾隆六十一年（1796）引見，據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履歷檔》載：「吉隆阿，鑲白旗蒙古人，年三十八歲，由繙譯生員考取貼寫中書補用。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內，實授中書。五十八年十月內，題署內閣侍讀，十一月內實授。五十九年保列一等。六十一年七月內，用山西汾州府知府。」¹⁹ 由此可知，吉隆阿係由繙譯生員出身，曾先後擔任乾隆朝內閣中書、侍讀等職。而他之所以在乾隆五十九年獲保列一等，極可能與當年奉命繕寫滿文〈熱河考〉以及〈重訂熱河考跋〉有關。

在〈熱河考〉之外，吉隆阿也曾在乾隆五十九、六十年間奉敕書寫其他滿文御製詩文。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人賈全所繪〈八駿圖〉，圖幅前後分別附漢、滿文御製詩一首，漢文無題，滿文題為 *Gu i coliha jakūn kuluk morin ucun*，即收入乾隆《御製詩四集》卷三十九之〈玉鏤八駿歌〉。²⁰（圖 10）值得注意的是，賈全繪畫落款以及漢文詩文御題皆為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冬月所作，該圖附滿文〈玉鏤八駿歌〉詩後則題稱乃「乙卯年季夏御筆。臣吉隆阿奉敕敬書。」（滿文 *niohon gūlmahūn aniya juwari dubei biyade han i arahangge. amban girungga hese be dahame gingguleme araha.*）由此可見，〈玉鏤八駿歌〉的滿文版實成於乾隆六十年，旋由吉隆阿繕寫附於賈全〈八駿圖〉之後。要言之，在乾隆五十九、六十年前後，吉隆阿曾負責繕寫〈熱河考〉、〈玉鏤八駿歌〉等滿文御製詩文，並以緯絲、書畫形式收藏於清宮中。

小結

〈熱河考〉深刻體現出清代考據學風盛行以及帝國版圖擴張等歷史脈絡下，新興地理知識的發展，其成文係受到乾隆二十一年官修《熱河志》的推動，又與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回部以



圖10 清 賈全 〈八駿圖〉附吉隆阿書滿文〈玉鏤八駿歌〉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中畫000238

及乾隆四十七年河源考察等重大歷史事件息息相關。與此同時，通過梳理故宮院藏漢、滿文緯絲本並比較相關史料，不僅能重構〈熱河考〉漸進的成文過程與版本增訂，亦可探索文本製作與清宮藝術的多元文化樣貌。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註釋：

1.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人緯絲〈乾隆書熱河考〉卷 <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Painting/Content?pid=1909&Dept=P>（檢索日期：2022年9月3日）。
2.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刺繡御筆熱河考卷〉 <https://www.dpm.org.cn/collection/embroider/230010.html?hl=%E4%B9%BE%E9%9A%86%E5%B0%84%E7%AE%AD%E6%B2%B9%E7%94%BB%E5%B1%8F%E8%BF%B0%E8%80%83>（檢索日期：2022年9月3日）。
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冊27，頁345-357；中華書局，《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冊18，《高宗實錄》，卷818，頁1098-1104。
4. 酈道元注，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陳橋驛復校，《水經注疏》（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冊中，卷14，頁1246。
5. 孔令偉，〈欽差喇嘛楚兒沁藏布蘭木占巴、清代西藏地圖測繪與世界地理知識之傳播〉，《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2本



- 3 分（2021.9），頁 603-648；孔令偉，〈蘇寧阿《萬里回疆圖》與十八世紀後期清朝的新疆地理知識〉，《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94 本（2023），待刊。
6. 中華書局編，《高宗實錄》，卷 1160，頁 546。
 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編，《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冊 31，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如意館〉，頁 830-831。
 8.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2，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行文房〉，頁 618。
 9.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32，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油木作〉，頁 441。
 10.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7，乾隆四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行文房〉，頁 637。案：此處「奉三無私」，即圓明園奉三無私殿。
 11. 關於乾隆朝書畫中的宋花邊，參：翁宇雯，〈乾隆朝《活計檔》中的「宋花邊」〉，《故宮學術季刊》，35 卷 2 期（2017.12），頁 141-211。
 12. 《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 45，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十一日〈廣木作〉，頁 573。
 13. 李國榮等主編，《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08），卷 40，頁 397。
 14.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收入《四庫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冊 289，頁 12-13。
 15. （清）乾隆，〈御製熱河攷〉，收入（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收入《四庫叢刊初編》，冊 289，卷首，頁 2-3。
 1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承德市文物局編，《清宮熱河檔案》（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2003），冊 7，頁 503-506、521-539。
 17. （清）張鑑等撰，黃愛平點校，《阮元年譜》（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 1，頁 14。
 18. （清）阮元，《寧經室集》，收入《四庫叢刊初編》，冊 1868（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上海涵芬樓藏原刊本），四集，卷 1，〈賜御筆熱河考墨刻卷恭謝摺子〉，頁 9a。
 19. 秦國經主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清代官員履歷檔案全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冊 2，頁 486。
 20.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寶全《八駿圖》卷 <https://digitalarchive.npm.gov.tw/Painting/Content?pid=1802&Dept=P>（檢索日期：2022 年 9 月 3 日）；（清）乾隆，《御製詩四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冊 32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清乾隆嘉慶武英殿刻本），卷 39，〈玉鏤八駿歌〉，頁 439。